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河北中共党史研究

论文选



中共党史出版社

封面设计：杨武玲

ISBN 7-80136-053-2



9 787801 360533 >

ISBN 7-80136-053-2/K·45

定 价：28.00 元

河北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责任校对：邹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1

ISBN 7-80136-053-2

I. 河…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河北-党史-文集 IV. K235.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898 号

河北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125 印张 510 千字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ISBN 7-80136-053-2/K · 45

定 价:28.00 元

编 辑 说 明

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十多年来,我省各级党史部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编纂任务,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编纂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广大党史工作者除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外,还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在不断提高业务、理论水平的基础上,笔耕不止,积极投入到学术理论研究中去,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近几年来,收获颇丰。一篇篇出自我省党史工作者之手的文章,或在有关学术部门的评选中获奖,或在国家、省、市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通过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得出了规律性的认识,对提高领导干部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历史经验,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为了做好党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切实加强我们党的历史和近现代史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辑出版《河北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一书,作为我省党史工作者的园地,不断推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为我省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室领导为尽快落实这一决定,在各处室工作任务重、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组织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河北中共党史研究论文》第一册的编辑出版工作。本书计45万余字,文章71篇,收入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章;二、党史专题和党史人物研究文章;三、有针对性地编发了部分党史业务研讨的文章。本书选入的文章,注重了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既反映了我党历史上较重大的题材,又颇具有我们河北的地方特色。作者们没有满足于“语

录体”的引用和资料性的堆砌，也没有满足于一般性的结论，更没有重复已经定型的观点，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新的视角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论证。这是我省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历史研究从浅层次的资料叙述向深层次的理论思维的发展，这无疑是我们党史部门的一个可喜的进步。它必将使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拓展到一个更新的领域，深入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在本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张平均完成了本书前期文章的征集、筛选工作，蔡峰峰完成了本书后期的文章篇目编排和技术处理工作，朱福奎完成了全书的通稿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疏漏和不尽人意之处，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与提高。

目 录

试论毛泽东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 主观条件	李继准(1)
论毛泽东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理论贡献	陈亚军(9)
浅析毛泽东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方面的贡献	赵联增(19)
试论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 ... 李 杰 马剑飞(30)	
试析建国前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	王 波(42)
试论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在冀东的运用与实践 ... 邓荣显(51)	
浅谈刘少奇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的贡献	张建华(60)
建国前夕刘少奇对经济建设和城市工作 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梁桂珍(72)
用历史教育人民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张葆文(81)
浅析邓小平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重大贡献——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 王润富(86)	
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色	杜丽荣(95)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韩树伟 赵雅君(108)	
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 周翠英(123)	
爱国主义——建设“四化”强国的伟大精神 动力..... 蔡峰峰(128)	
关于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几点思考..... 杜丽荣(134)	
懂得些中国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同志注重历史学习思想的一点

- 思考 王 波(145)
试论共同富裕 韩玉春(160)
试论允许部分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 ... 陈永平(165)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 李 杰 马剑飞(174)
浅析邓小平为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
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王 波(184)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杨丽芬(193)

※ ※ ※ ※

-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郑云德(202)
试论李大钊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安素阁(213)
学习李大钊的思想与实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周志远(222)
李大钊关于农民运动的实践与理论
初探 魏 军 齐行珍(231)
李大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邱 琦(244)
李大钊伦理思想初探 郑云德(254)
试论李大钊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和贡献 邓荣显(268)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式管见 李继准(279)
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 刘心长(288)
试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 李碧山(31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解放的
根本保证 李继准 王 波 梁海江 丁建同(325)
浅析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 马剑飞(336)

试析中共唐山地方组织早期活动的基本特点	胡殿玉(343)
试论 1922 年唐秦地区产业工人联合罢工的重要历史地位	胡殿玉(357)
浅谈张兆丰为组织“共产党军”作出的贡献	赵洪泽 杜学智 徐占福(366)
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始创于北方	马熙群(379)
从玉田暴动的北方区域特征看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胡殿玉(384)
论玉田暴动发生的主要原因	梁桂珍(390)
关于引发玉田暴动之历史原因的若干思考	周志远(397)
试谈日军逼签《何梅协定》的两个借口	马秀山(405)
斯诺与一二九运动	王 静(412)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王 静(422)
冀南抗日根据地开辟的依据	刘心长(432)
试析冀南抗日根据地开辟的特色	刘心长(437)
邢西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的策略研究	黄国治 张书才(446)
太行根据地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	南振国(454)
从冀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看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性	南振国(462)
试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	赵胜军(468)
论冀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与贡献	李成民(479)
论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性	王永保(492)
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长城线上“无人区”	陈 平(508)
冀热辽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杜丽荣(512)
关于西柏坡精神若干问题的探讨	吴 英(530)
冀东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原因初探	梁桂珍(538)

唐山市“三反”“五反”运动探析	安素阁(544)
一次成功的干部教育运动	
——从丰润县“三反”运动看当前反腐倡廉 教育	史爱芝(550)
从迁西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杜致成(555)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探析	李连珍(562)
试述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运动	马英民(572)
论胡开明同志关于“三包”到组的建议	雷致敬(584)

※ ※ ※ ※

简述社会主义时期地方党史研究中的几个 问题	
问题	赵云山(591)
浅谈征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资料问题	李连珍(597)
关于编写县党史的几个问题	吴永田(603)
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方党史的几点 构想	
怎样写党史人物传记	宋敏(618)
谈党史资料管理对征研用的作用	金象增(628)
党史写作需借鉴一些文学表现手法	杨在泉(632)
叩其心脉 传其神质	
——撰写人物传记之我见	王德奎(635)

试论毛泽东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主观条件

李 继 准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从本质上说,这个问题是由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曾作出过许多艰辛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发现并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有其深刻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就其主观条件说,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与同代人相比,在于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从理论上最先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最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①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中央负总责的瞿秋白,曾赞誉毛泽东和彭湃是中国两个“农民运动的王”。^②如果说,彭湃是党内首先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且是成效卓著第一人的话,那么,毛泽东便是党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解决了农民问题的第一人。

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他从1925年开始研究和从事农民运动。这年他回湖南老家养病,进行了农村调查,并组织了20多

①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 《湖南农民革命(一)》序言,汉口长江书店1927年4月版。

个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对军阀赵恒惕及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实际斗争中，他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1926年，他在广州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1927年，他顶着党内外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种种非难和谩骂，到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热情地支持和讴歌他们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举动。

毛泽东不仅积极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而且对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总结，从而为党领导农民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在大革命时期所撰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深邃的眼光，科学地阐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揭示了由雇农、贫农和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伟大力量，说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这一革命根本问题的高度出发，指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歌颂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痛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种种奇谈怪论。在这些著作中，虽然不能说毛泽东就已经明确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但是，正因为他最先从理论上确立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不是一般的，而是“极端的”，所以，大革命失败后，他便在实践上成了“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①

第二，毛泽东深谋远虑，于大革命失败前后，曾多次提出“上山”的主张，这说明他早就有在农村或山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准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5月

^①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1日，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向湖南农运干部提出了“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① 的响亮口号，明确要求当地革命力量用这种方法去对付反动势力对革命力量的摧残；6月下旬，针对武汉国民政府收缴工农自卫军的枪械、解散工农武装的错误举措，毛泽东又对湖南工农武装的去向问题提出不能合法保存就“上山”的主张；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搜捕政策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协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则不同意这种错误主张，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法。”他再次明确提出“上山”的主张，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如果说，上述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曾多次提出的“上山”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在大革命遭受挫折时，如何在各种方式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将党手中仅有的一点点武装力量保存下来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在从党的“八七”会议到上井冈山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的“上山”主张，就已经闪烁着组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正式军队，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政治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火花。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陈独秀不注重武装斗争的错误，尖锐地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表示赞成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瞿秋白要留他在中央工作，但毛泽东毅然表示：他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去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并请中央批准他的要求^②。8月9

① 据何长工的回忆。

② 黄少群、张培林著：《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6页。

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有人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部队往广东去的问题，毛泽东断然提出批评说：这是很错误的。湖南的农民组织比广东还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在湖南组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个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并强调指出：“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①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赞同与支持，于是中央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于8月12日任命他为中央特派员，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领导湖南全省的秋收起义^②。在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主张南下萍乡，向井冈山进军。这时，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当即反驳道：“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由上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以其敏锐的马列主义洞察力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在革命遭受失败的情况下，如何把革命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村或山区去，在那里积聚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土地革命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他能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及时地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的既定计划，带头“上山”，引兵井冈，在那里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①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9日。

② 黄少群、张培林著：《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7页。

第三，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并使自己的革命实践紧紧地和中国国情统一起来。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和社会性质，一句话，谁不懂得中国国情，“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①由此可见，是否真正认清了中国国情，乃是中国革命成败与否的关键。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错误，却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与之相反，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坚持“城市中心论”，而是毅然决然地奔向农村，领导农民在“山沟”里闹革命，做了无产阶级的“山大王”。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农民，“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在王明“左”倾高压下，毛泽东义无反顾，不改初衷，执着地坚持着在农村开辟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斗争。究其原因，乃在于他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中国国情。也正是这个时期，在战事频仍的情况下，毛泽东写下了诸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历史名篇，对中国基本国情作了十分科学而精辟的论述，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中国具体国情认识得尤为精当。他认为：(1)蒋介石逐步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拥有一支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强大得多的反动军队和严密的特务组织，对革命人民实行更残暴、更野蛮的反革命统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摧残，党的组织被破坏殆尽，革命工作的基础变得十分薄弱。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艰苦的重新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以建立再次复兴革命的基础；(2)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系并不都顺从他的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665 页。

治，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给了共产党以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的时间和空间；(3)中国的大城市是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绝不允许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共产党已经没有象广州、武汉那样的城市根据地，在城市里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4)广大的农村地区，成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最适宜于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武装农民进行起义，在农村建立革命的基地。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认识到这一规律，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城市中心论”。这时，唯有毛泽东远见卓识，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的认识是清醒的、正确的，并将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紧紧地和中国国情统一起来。因此，在秋收起义受挫的情况下，他断然地但正确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

第四，毛泽东敢于反潮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他能够发现并建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引兵井冈，这在实际上已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山区和农村，这是中国革命战略任务伟大转变的新起点。但是，这种“伟大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

(1)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问题，虽然论著颇丰且精辟，但对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的“本本”上却只字未提。

(2)俄国十月革命是从城市发动起义并取得成功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便形成了一种模式，即“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一直用这种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而怀疑和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直到1940年，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了它的巨大生命力，共产国际对此仍然存有疑虑，担心中国共产党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下，能否

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能否建设和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当周恩来到共产国际去向他们说明：“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①

(3)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共产国际强制中国共产党用“城市中心论”模式规范自己的革命实践。这就给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潮流下，中国党内是极少有人敢违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越雷池一步的。相反，党内一些人却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明，视为金科玉律。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极力鼓吹“城市中心论”，并把毛泽东的乡村中心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②，“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③，而加以压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顽固地坚持以城市为中心，要求红军去占领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否认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给他扣上诸如“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主义”和“狭隘经验论”的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 1931 年 11 月赣南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被撤销中央局书记起，到第五次反“围剿”这 3 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受排挤、遭打击的地位，在中央领导层里处于少数，没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没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没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胆识，没有不唯“本本”，不听命于指挥棒，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是绝对不能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78—179 页。

②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 年 6 月 15 日。

③ 李立三：《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红旗》第 97 期，1930 年 4 月 5 日。